

谁的责任：中国媒体气候变化的责任归属话语研究 ——基于《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2010—2018)的气候报道分析

李 静

摘 要：本研究从框架理论出发，运用社会认知话语分析，考察2010—2018年《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对气候变化责任归属的话语实践。研究发现：中国媒体的责任归属话语表达与气候变化作为国际议题或国内议题密切相关。国际政治是媒体气候报道最为显著的主题，国家的责任、国家及同盟间责任区分主导着媒体的话语表达。近年中国媒体也开始将气候变化呈现为国内议题，凸显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的责任，也逐渐重视本地气象或环境风险下的民众个体责任。但总体上，媒体气候报道预设了国家或政府作为责任主体、国家间责任区分的认知图式，该认知图式可能也主导着公众的信息理解。研究拓展了我们对气候变化媒体呈现的认识，也为面向公众的气候传播实践提供启示。

关键词：气候变化；责任归属；框架理论；社会认知话语分析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9)05-0116-10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9.05.011

气候变化是当今日益凸显的一个全球公共议题。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过度排放温室气体导致的气候系统紊乱或错位，使经济活动、城市建设、公共健康、区域稳定等人类社会的众多领域面临风险。气候变化的过程漫长、系统且难以察觉，绝大多数普通人都无法亲身体验；所以，气候变化成为一个议题、进入公众视野，有赖于媒体的中介化和具象化。有关气候变化的媒体呈现，责任归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方面，当今全球气候治理主要围绕“谁应该承担责任”展开，探究责任归属有利于观察不同话语系统（如政治、媒体）之间的互动。另一方面，责任归属可能影响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和行动参与。中国作为气候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国内媒体如何呈现气候变化责任归属？这种责任归属可能对公众产生怎样的影响？本研究考察《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2010—2018年的气候报道，从框架理论出发，运用梵·迪克的社会认知话语分析方法，系统探究媒体有关气候变化责任归属的话语表达及其隐含的认知图式，为面向公众的气候传播活动提供指导。

一、理论与文献综述

（一）框架理论

广泛运用于媒体内容研究的框架理论，其理论来源可以追溯至欧文·戈夫曼的著述。框架被界定为生产“现实一隅”或“意义特定范畴”的规则^{[1](P3-4)}，表现为人们用特定术语对社会中看似无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空间语境下‘一带一路’跨文化分众传播与话语策略研究”（17BXW103）

作者简介：李静，传播学博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4）

穷的事件进行定位、感知、辨认和标签化，即对社会生活中的经验进行组织。在媒体报道中，框架是一个“选择—凸显”的过程：选择某个感知到的现实方面，使其在文本中更加显著^[2]。潘忠党等^[3]进一步指出了框架在新闻文本中的运作方式，“将新闻报道的不同语义要素（标题、引语、导语、视觉表征和叙事结构）联结成一个连贯的整体，指出这个议题到底是什么”。除了界定问题，媒体框架还具有阐释原因、提供道德评价和问题解决处方等功能^[2]。媒体框架虽然能体现在新闻文本的各要素中，但它的形成不是内在于媒体内容；相反，它是不同利益相关方（如政府部门、商业力量、媒体机构、社会组织）参与的意义竞争场所^[4]。

运用框架理论对媒体内容开展经验研究，始终要面对一个问题：如何在媒体内容中识别出框架，对框架进行命名、分类？对框架的运用有三种主要取向：实证、社会建构和社会认知取向。在实证取向下，研究者根据各自的研究对象、研究目标，从具体的媒体内容中萃取框架。由此得出的框架类型五花八门，高度依赖媒体报道内容。近年来，Semetko 等^[5]提出的通用框架备受关注，包括冲突框架、人情味框架、经济结果框架、道德框架和责任框架。它们是能够跨越媒体类型、所在国家和报道议题的一般性框架，便于开展比较研究。

与实证取向相比，社会建构和社会认知取向有更多相似性。Gamson 等^[4]在社会建构取向下发展的框架概念，不仅关注媒体内容及其“符号装置”（如隐喻、事例、标语、描述、视觉符号），而且关注特定历史、经济和政治脉络下不同行动者开展的实践行动。简言之，框架揭示的是行动者在公共生活中的意义建构过程^[6]。社会认知取向也重视社会语境和行动者的实践，它与社会建构取向最大的区别在于：强调框架不能独立于受众的解读而存在^[3]。借鉴梵·迪克^{[7](P32-60)}从社会认知视角对新闻话语结构的探讨，Pan 等^[3]发展出了新闻文本的框架分析模型。框架不仅要揭示意义的建构，还要考察意义生成、共识达成的社会认知基础。本文将在社会认知路径下运用框架概念和框架分析。

（二）气候变化的媒体框架

在探讨媒体如何呈现气候变化的研究中，框架是一个运用广泛的理论视角。这类研究从不同国家、不同媒体的气候报道中识别出常见的框架类型。比如，从框架功能区分出的问题界定、原因鉴别、道德评判、解决办法框架^[8]；从报道内容归纳出的国内政治、国际关系、经济、科学研究、天气等框架类型^{[9][10]}。

就通用框架而言，责任归属是媒体气候报道常用的框架类型，通过指认对问题的产生或解决负有责任的行动者来组织内容。Dirikx 等^[11]对荷兰和法国大报的考察显示，气候报道最常用的是经济后果框架和责任归属框架，冲突、人情味框架次之，道德框架几乎没有出现。Xie^[12]对中美两国的主流报纸、网络博客开展对比研究，虽然发现框架使用在国家、媒体类型之间存在差异，但责任归属仍是频繁出现的框架类型。Han 等^[13]对 2005—2015 年中国报纸的气候报道进行内容分析，也有类似的发现。责任归属框架在中国报纸气候报道中的可见度仅次于自然和人类影响，并且责任归属框架的可见度在不同类型报纸（政党报、都市报、专业报）之间都比较一致。

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媒体气候报道呈现出政治化趋势，责任归属框架的运用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对媒体报道的内容分析^[11]显示，责任归属与冲突框架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再现了国家及政府之间在“谁应该承担责任”问题上的争论。结合媒体气候报道的信源使用，更能说明这一政治化趋势；责任归属和冲突框架与政府官方信源呈正相关^[13]，政府是最主要的议程设置者。当气候变化议题越被政治化，意识形态立场在媒体报道中发挥越关键的作用^[14]。

（三）气候变化责任归属的复杂性

“谁应该承担责任”并不是一个清晰、容易回答的问题。在 Giddens^{[15](P1-9)}看来，一国政府是气候治理的首要责任主体，既要参与全球谈判和全球协作，也要在国内推进气候变化政策与既有政

治经济目标相融合。同时,他认为普通个体也负有责任,因为气候变化不仅是梦魇、大灾难这样富有戏剧性的时刻,更是人们日复一日的生活惯例,如过度依赖肉食、无节制消费。Cerutti^[16]持有类似的观点:普通民众虽然不像商业公司的领导者、公共行政机构的管理者那样,需要为具体的环境过失承担责任,但应该意识到日常生活里的消费主义态度及其环境后果。

乌尔里希·贝克预设全球气候变化风险可能释放出一种“世界性时刻”(Cosmopolitan Moment)或“世界主义观”(Cosmopolitan Vision)。它意味着人们既把自己视为面临危险的世界的一部分,也将自己置于当前所处的本地历史和生存条件中^{[17](P343-368)}。“世界性时刻”还表现为“责任的一种全球连结”^{[18](P54)}。贝克看到大众媒体在营造“世界主义观”上的潜力,国际报道将气候变化对某一地及人群的影响传播到世界各地,创造全球公众的共时参与和共同苦难^[17]。同时他又充满忧虑,因为大众媒体仍然要透过国内新闻透镜和指涉框架来报道全球议题。贝克的忧虑得到了经验检验,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常常跃居全球视野之上,主导着各国媒体的气候报道话语^{[19][20][21](P158-173)}。在气候变化责任归属上亦是如此^{[22](P211-223)},Berglez等发现瑞典媒体气候报道中存在“责任民族化”倾向,认为这是“日常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

责任归属的复杂性在媒体报道中也有体现。Olausson^[23]考察瑞典报纸的气候报道时,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媒体对不同的气候应对办法——减缓与适应——有不同的责任归属倾向。气候减缓被归属为跨国责任或国际责任,因为媒体对气候减缓的呈现受国际政治事件的驱动。气候适应则被归属为某个国家或地区的责任,它更多地受到区域性极端天气事件的驱动。Billett的研究^[24]发现,印度媒体在呈现气候变化的影响时强调“本地”风险,但在责任归属上仍然凸显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责任,表现出一种“风险—责任分离”。

媒体气候报道的责任归属可能会影响公众的认知。媒体责任归属框架影响人们对政治和社会公共议题(如贫穷、犯罪)的态度或政策支持度,已经得到检验。近年有研究聚焦气候变化议题,探索媒体、公众对气候变化责任归属的认识、公众行动之间的关联。它们通常将责任主体区分为内部(如个体、普通民众)与外部(如企业、政府或社会)。Richard等^[25]的实验研究显示,当实验参与者认为个体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负有责任时,会倾向于对媒体信息进行系统处理,进而可能产生更加稳固的态度和行为。另一种观点恰好相反:认为在促进公众行动参与上,强调政府或社会责任比强调个体责任更有利;因为对个体责任的凸显往往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这对公众而言是一种威胁^{[26][27]}。Howell等^[28]揭示了更加复杂的作用机制:媒体内容的责任归属对人们产生何种影响,主要取决于个体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担忧程度。

概言之,系统分析媒体报道对气候变化责任归属的框架,是探究公众的媒体使用、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参与应对行动三者关系的重要部分。基于以上对相关理论和研究的综述,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中国主流媒体如何呈现气候变化的责任归属?谁被凸显为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主体?责任归属方式隐含了怎样的认知图式?

二、研究方法

(一) 媒体和报道内容的选取

研究选择《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为媒体样本。《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它的报道反映、传达出官方对事件或议题的态度和观点。《南方都市报》是一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综合性报纸,注重国际国内重大新闻报道,近年来也专注环境报道和科学报道。两者既重视气候报道,也分别代表了政党机关报与市场报;以它们作为媒体样本,能够较好地反映中国主流媒体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话语表达倾向。取样时段是2010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以2010年为起

点，是因为它标示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结束，开启了一个不同于《京都议定书》时期的气候治理新阶段^[29]。2015年《巴黎协定》的达成，2017年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都是全球气候治理的“焦点时刻”。

本研究从慧科新闻搜索数据库中获得报道文本，设定“气候变化”为检索关键词。在检索获得的原始数据的基础上，研究者对报道内容进行人工筛选，排除那些简单提及“气候变化”但没有展开叙述的报道。研究最终获得报道文本1368篇，《人民日报》879篇，《南方都市报》489篇。

（二）社会认知话语分析

为了回答上述研究问题，本文将运用荷兰话语研究者Van Dijk倡导的社会认知话语分析方法。和话语分析的其他路径相比，社会认知路径将认知视为话语、社会之间的关联界面。“话语”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运用与权力密不可分。权力（再）生产的社会条件（如精英群体、群体关系、制度机构），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借助话语来实现，在话语层面留下痕迹。在解释微观话语与宏观社会条件的关联时，Van Dijk强调社会认知在其中发挥的桥梁作用：“所有的理解过程、社会影响和作用过程都受到团体成员个人和整个团体的社会认知的控制”^[7]。

社会认知话语分析使研究者能够探究话语生成和话语理解的一般心理图式。借鉴认知心理学有关记忆结构、记忆过程的研究成果，以情境记忆和社会记忆的运作为基本，Van Dijk^{[30](P86-89)}详细阐述了话语单元、群体认知（包括价值、群体信念、态度）和个体认知之间的关系。社会认知路径已经形成了一套基于语言学、适用于新闻文本的分析工具，本研究运用的分析工具主要有以下几种。

语义宏观结构：一般意义上的“主题”，它是文本的纲要、主旨或最重要的信息，对心理图式的影响最为重要。统领新闻报道的主题通常出现在标题和导语中。

图式结构：话语的总体形式。新闻图式结构表现为标题、导语、主要事件、背景、后果、口头反应、评论等范畴，按倒金字塔或相关性原则呈等级排列。何种主题出现在范畴中、何种主题的等级被提升或下降，都是话语实践的体现。

局部连贯：话语的微观结构。它分析的是命题如何按照时间顺序或因果关系来组织，集中体现在对事件或行为的归因上。

风格与修辞：风格是言说者的社会特征、语境特征在语言表层的显现形式。本文主要分析词汇风格，通过具体词语的选择来分析言说者的态度。修辞是言说者为增加信息的真实性、合理性和可信度使用的各种策略手段，如直接引语、可靠的消息来源、精确的数据等。

三、研究发现与讨论

总体来看，2010—2018年间，《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都主要将气候变化呈现为“国际政治”问题，国际气候谈判、气候外交是最常见的主题。气候变化对中国本土的影响，尤其是它在区域天气、环境上的体现，也比较频繁地出现在报纸气候报道中。但呈现天气与环境影响的报道数量有限，主题也不够集中，气候变化与区域天气的关联零散地出现在报道文本中。与国际政治和外交主题相伴随，责任归属是两大媒体呈现气候变化的主要框架。

科学证据也是媒体气候报道的一个常见主题，包括科学界新近成果，IPCC、世界气象组织等国际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科学证据被用来论证气候变化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并且运用数据的修辞功能，凸显气候变化风险的全球性、严重性和紧迫性。比如，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全球温升2℃或1.5℃、“临界值”、“大门正在关闭”、“最强预警”等表述。“科学证据”作为一个相对的次级主题，往往与“国际政治”这一更加显著的主题相结合。也就是说，媒体报道借助科学证据将气候变化呈现为严峻的全球风险，将其置于国际气候谈判的语境下，呼吁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行动。但不容忽视的

是,在对共同行动的呼吁中,凸显“他们”与“我们”的责任区分仍是一个普遍现象。

(一) 以国家为边界的责任区分:积极的“我们”与消极的“他们”

以“国家”为边界的责任区分,在《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的气候报道中都十分普遍。如 Berglez 等^[22]用“责任民族化”一词所表达的那样,责任归属沿着积极的“我们”与消极的“他们”这一轴线分布,凸显负责任的“我们”与逃避责任的“他们”。在新闻文本层面,责任归属框架和冲突框架存在明显的共现关系,再现了不同国家及同盟之间在气候谈判中的争论。责任区分主要针对以国家为主体的减排行动。与气候适应相比,减排有更加明确的责任主体、行动方式和可测量的行动目标,也是国际气候谈判的焦点。每年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变化会议是媒体呈现责任区分的关键事件,“博弈”、“硬仗”、“暗战”、“加时赛”、“最后一搏”或“激烈交锋”等隐含对抗的表达在标题中凸显。比较而言,市场倾向的《南方都市报》更加频繁地呈现气候谈判中的冲突、使用对抗性和戏剧化的表达。

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我们”与“他们”指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国内报纸对消极“他们”的凸显,主要基于责任的“债务”涵义,即因过失行为产生的“债务”。“历史债”、“气候债”和“碳债务”是媒体气候报道常用的词汇。发达国家历史上的温室气体排放是气候变化问题产生的主因,因此负有问题产生的责任;因更早步入工业化,积累了丰厚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成果,发达国家也应承担问题解决的责任。总体上,《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都倾向于在“债务—偿还”框架下呈现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包括作出更大幅度的减排承诺并率先开展减排行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有利于减排的技术。发达国家逃避责任,以直接论断、权威信源的观点等形式出现在新闻标题中,呈现为联合国框架下气候谈判缓慢乃至失败的主要原因。

气候正义是中国媒体呈现发达国家责任的重要话语策略。气候正义是指:所有物种、人类不同世代和当今所有人都有权平等分享气候系统的惠益;每个国家和个人都应公平分担稳定气候系统的责任和成本;气候变化的制造者应向受害者提供补偿^[31]。中国媒体呈现的气候正义主要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损失损害补偿。报道内容包括两大方面:其一,在报道气候会议过程中关注发展中国家(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和民众)的诉求和呼吁;其二,呈现亚、非、南美等地区面临气候变化风险的脆弱性。2013年的阿根廷特大洪水、将菲律宾带入“全国灾难状态”的超强飓风“海燕”都被视为气候变化的后果。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气候风险不仅作为单篇报道的主题出现,更是作为国际气候谈判的次级主题发挥修辞作用,凸显发达国家的不负责任形象。在饱受饥荒、饮水缺乏、疟疾、冲突等威胁的非洲,“贫穷的人们在等待德班的决定”^[32],更确切地说是等待发达国家的积极行动。

与“他们”的责任相对,中国的责任被呈现为对全人类和本国人民共同利益的追求,是扮演全球治理领导者角色应承担起的职责。面对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失败后国际舆论的指责,《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都投入了大量报道进行回应,着重解释中国在减排行动上“可承担的责任”。和已有研究^[33]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观察相一致,2011年起中国在坚持“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基础上,日益凸显自身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重视全球共同利益及中国的贡献。与哥本哈根之后相对被动的回应不同,中国媒体开始主动设置报道议程,如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从媒体报道可见,与发达国家基于“债务”的资金援助作出明确区分,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所体现的中国“责任”被强调是一种“义举”。2017年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之后,这种作为“义举”、为全球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中国责任在媒体报道中得到进一步凸显。

媒体报道中的气候变化责任主体划分与国家气候外交活动密切相关。除“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这个基本维度外,某些情况下,“他们”与“我们”分别对应的是伞形集团与基础四国(或77国集团加中国)。消极“他们”与积极“我们”的区分还体现在局部语义连贯、尤其是行动归因上。

具体来说，中华民族的品格、为全人类的长远利益、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等命题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承担被置于因果关系中。也就是说，中国承担责任是出于自身内部原因。相反，与“他们”（主要是伞形集团国家）的行为形成因果关系的通常是环保组织、社会积极分子或民众对他国政府的抗议。由内部原因驱动的行为被认为是稳定、恒久的，而由外部环境因素驱动的行为则被认为是稳定、偶然的。

（二）普通民众的责任：从总体的“我们”到本地语境下的“我”

在2010—2018年两大媒体的气候报道中，如果说国家间责任区分是一个共同的、持续存在的现象；那么在国内层面，对普通民众责任的呈现则有一个明显的转变。除前文提到的“国际政治”外，“国内政策”主题在《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的气候报道中也十分显著，政府被凸显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责任主体，包括经济、能源、生态保护等多方面措施的制定和执行。尽管气候应对需要多方主体参与，碳交易市场也是该时段媒体关注的议题，但政府角色被置于首位。此外，普通民众也是常见的责任主体，并且从总体、模糊的“我们”转向本地语境下具体的“我”。2016年后，媒体报道开始将“我”的责任置于国际气候谈判的语境下，与国家责任建立关联，将看似遥远的国际气候谈判“拉近”以促进公众参与。

大多数情况下，媒体关注“环保教育与动员”、尤其是“地球一小时”活动时，才会强调民众的责任。这类报道以“所有人”、“全人类”等词汇直接呼吁集体的“我们”要承担责任。或者，通过展示全球多个地方、同一时间的环保行动，仪式性地营造一种“责任的全球连接”。此外，该主题的报道还通过明星或环保达人的事例来暗示个体对自身责任的认知。无论是集体的“我们”还是个体的“我”，这类报道主要受趣味性和故事性驱动，仅关注活动或事件本身。这在市场倾向的《南方都市报》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围绕“地球一小时”的报道基本局限于各类充满新奇性、趣味性的市民活动，如求婚、烛光晚餐、户外音乐、夜跑等。Cerutti^[16]提出形成个体内心责任感需要三个条件：理解自身行为是气候变化发生的原因，相信气候变化的不良后果会对他人造成伤害，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行为以避免或减缓不良后果。除了强调采取某种环保行为的趣味性外，“环保教育与动员”类报道没有对上述三方面、尤其是前两个方面做出清楚的解释，可能也难以培育个体责任感。

国家与普通民众作为责任主体，在中国媒体气候报道中几乎是分离的，这在报道主题上有明显体现。当报道关注国际谈判与国内政策时，凸显国家、政府作为责任主体；当报道呈现气候变化相关倡议活动时，才强调民众的责任感。但近年来，两类责任主体开始被整合到同一报道中，这在《人民日报》的气候报道中尤为明显。这类报道关注气候变化的本地后果，如夏季高温、极端天气灾害、物种灭绝、雾霾等，将气候变化呈现为一种眼前而非遥远的风险。报道清楚阐释全球气候变化与本地气象或环境风险之间的关联，提出人类活动是气候变化发生的主因，进而强调“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负责任举措，呼吁民众个体在日常生活中开展应对行动，凝聚成“绿色合力”。与环保倡议活动中的意识唤醒和象征行动不同，这类报道既把个体行动落实到衣、食、住、行、游的具体方面，还将个体的日常行为与气候变化问题的产生和应对进行勾连。

雾霾与气候变化的关联在近年《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得到凸显，也是将个体置于本地环境风险、呼吁“我”的责任感的体现。如“气候变化离我们遥远吗”一文^[34]所阐述的那样，在巴黎的国际气候谈判看似与国内民众相距甚远，事实上中国多个城市爆发的雾霾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2013年以来，大范围、长时间的雾霾天气引发民众对自身健康的强烈忧虑，被形象地称为“心肺之患”。另一方面，巴黎气候大会之后，政府部门日益重视国内民众的行动参与，强调雾霾与气候变化“同根同源”，即化石能源消耗、温室气体和污染物的排放。作为一种个体性风险，雾霾成为政府部门及媒体报道重塑气候变化风险、唤起个体责任感的重要策略。

(三) 媒体话语中的认知图式

社会认知话语分析将话语表达和理解与个体及群体层面的认知关联起来。媒体话语中广泛存在的责任区分意味着生产者设定了责任归属的群体身份(在这里主要是民族国家),也预期人们在接收、理解话语时与他们共享同一个认知图式——责任归属的群体边界。这种认知图式预设与框架效果研究中的“框架形成”和“框架激活”是一致的^[35]。当媒体报道的议题还是一个新鲜少见的议题时,媒体框架比较容易形成受众框架。随着媒体报道越来越多,议题为公众所熟知,媒体容易将受众存储在长时记忆中的认知图式激活。可见,从话语的认知层面来看,公众在接收、理解国内媒体的气候报道时,可能会更多地强调国家及政府的责任,关注以国家为边界的责任区分。

当公众理解气候变化的责任归属时,凸显国家责任及国家间责任区分可能会对相应的态度、行为意向产生消极影响。Jang^[36]注意到美国媒体经常对中、美两国的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排放进行对比,探讨了这种“本国—他国”区分是否会激发受众的民族身份认同,进而产生认知偏向。该实验研究发现,在强调本国(美国)能源消耗的媒体内容环境下,人们倾向于将气候变化责任归结于内群,认为气候变化产生的原因是不可控制的自然力量,从而降低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度和对减缓政策的支持度。在凸显他国(中国)过度消耗能源的新闻情境下,人们将气候变化责任归结为外群,但不会将气候变化的形成原因归结为人类行为,也不会出现环保意识和政策支持度的提升。对公众行动而言,仅强调本国责任是不够的;而过度凸显他国责任有害而无益,它可能会加剧个体对不公平和不公正的感知,激发群体间的敌意,不利于全球协作。

此外,国家间责任区分所暗示的政治化线索也可能给气候变化科学知识的公众传播带来影响。在美国,党派倾向使公众对气候变化的信念和态度出现极化,媒体提供科学信息不仅未能弥合分歧,反而让极化愈发严重^[37]。Bolsen等^[38]发现,不仅是党派倾向,一般的政治化线索也会产生强大影响:当气候传播内容包含了政治化线索时,相关科学信息将不再对公众的信念和政策支持产生正向影响。如前所述,科学研究通常与国际政治主题相结合,发挥修辞功能;由此推断,媒体内容中的国家间责任区分很可能会影响公众对气候变化科学知识的认知。

中国媒体也开始重视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个体责任,尽管与政府责任相比它不占据主导位置。个体、政府两种不同的责任归属对民众认知及行动的影响,已有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个体“我”的责任感能够促进人们对气候变化信息进行系统处理,形成更加稳定的应对态度及行为意向^[25]。另一方面,与个体责任相关联的应对行动通常诉诸于既定生活惯例的改变,对个体的某些身份产生威胁;相反,凸显政府责任反而有利于促进公众的行动参与^{[26][27]}。事实上,个体责任与国家(政府)责任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交叠的,在实验材料中难以区分。本研究对中国媒体气候报道的分析也发现,国家责任与个体责任被关联、整合到同一报道文本中。以此为基础,后续研究可以更深入地探究责任归属、公众态度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及解释机制。

四、结 论

通过对2010—2018年《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的气候报道进行话语分析,本文探讨中国媒体如何呈现、表达气候变化的责任归属。研究发现,责任归属的话语表达与气候变化作为国际议题或国内议题密切相关。国际政治是媒体气候报道最为显著的主题,国家的责任、国家及同盟间责任区分主导着媒体的话语表达。这是《人民日报》与《南方都市报》气候报道的一个显著共同特征。事实上,国家间责任区分或“责任民族化”现象^[22]存在于多个国家的媒体气候报道中,正是政治议程、国家气候谈判立场及诉求强大影响的体现。中国媒体将气候变化视为外交议题多于环境议题^[39],意味着它们会更加注重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官方基本立场的呈现和说明。这

也解释了为什么《人民日报》和《南方都市报》在气候变化责任归属上会表现出更多的一致性。

从跨国比较视野来看，中国媒体在气候变化责任归属上聚焦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使气候正义能够在国际媒介争论中凸显。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媒体气候报道还是对报道的研究，都很少出现“气候正义”话语，西方国家在媒体报道和相关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在气候变化威胁面前最为脆弱的国家则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31]。西方媒体在环境问题上倾向于呈现中国的负面形象，缺乏气候正义视角也是其内在原因之一。一方面，西方媒体认为其国内环境报道秉持的“自然生态的平衡”理念比中国“人的发展”理念更加进步^[19]。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内部，商业力量对既得利益的强力维护在媒体气候报道中也被边缘化了^[21]。在当今不平等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中，西方国家对贫穷国家的碳排放转移和其他生态殖民形式，西方媒体也是甚少提及。

本文另一个有趣发现是，近年中国媒体气候报道更具连贯性，将个体“我”的责任与“我国”的责任关联起来。随着气候治理的推进，气候变化也开始被媒体呈现为国内议题，凸显政府在政策制定方面的责任，也涉及民众个体责任。国家（或政府）责任与民众个体责任在较长时间里都处于分离状态，国家责任与国际政治、国内政策相关，而民众责任与环保倡议活动相关。在报道相关倡议活动时，两大媒体对个体责任的表达基本处于意识唤醒和象征性行动阶段，并且《南方都市报》更加关注活动的新奇性和趣味性，难以阐明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个体责任。近年《人民日报》气候报道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将个体责任与国家责任、本地气候或环境风险与国际政治关联起来，通过将气候变化问题的产生及应对与国家行动、个体行动进行勾连，呼吁民众的个体责任感。关联国家（政府）责任与个体责任能否有效唤起个体责任感，并促进个体参与气候应对行动，是后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从话语的社会认知角度来看，尽管提及个体责任，但媒体气候报道整体上预设了国家或政府作为责任主体、国家间责任区分的认知图式。该认知图式可能也主导着公众的信息理解。应对气候变化问题需要广泛的公众参与；向公众提供充分、恰当的气候变化信息和科学知识，改变公众态度和行为以促进气候变化的共同应对，正是气候传播的题中之义^[40]。媒体报道凸显国家间责任区分和积极的“我国”，能够为本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营造舆论环境，但可能对面向公众的气候变化信息传播产生不利影响。就面向公众的气候传播实践而言，媒体报道不能过度聚焦国际政治博弈，应该不断丰富报道主题，如生态、食物、贫困、公共健康等，由此提升气候变化与普通民众的相关度，促进个体的责任认知和行动参与。

参考文献

- [1] Goffman, E.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M].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6.
- [2] Entman, R. M.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3(4).
- [3] Pan, Z., G. M. Kosicki. Framing analysis: An approach to news discourse [J].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993(1).
- [4] Gamson, W. A., A. Modigliani. 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nuclear power: A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9(1).
- [5] Semetko, H. A., P. M. Valkenburg. Framing European politics: A content analysis of press and television news [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0(2).
- [6] 潘忠党. 架构分析：一个亟需理论澄清的领域 [J]. *传播与社会学刊*, 2006(1).
- [7] [荷] 梵·迪克. 作为话语的新闻 [M]. 曾庆香,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3.
- [8] Trumbo, C. Constructing climate change: Claims and frames in US news coverage of an environmental issue [J].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1996(3).

- [9] Brossad, D., J. Shanahan, K. McCombs. Are issue-cycles culturally constructed? A comparison of French and American coverage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J].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04(3).
- [10] Boykoff, M. T.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discourse in UK tabloids[J]. *Political Geography*, 2008(5).
- [11] Dirikx, A., D. Gelders. To frame is to explain: A deductive frame-analysis of Dutch and French climate change coverage during the annual UN Conferences of the Parties[J].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10(6).
- [12] Xie, L. *Climate Change in the Changing Climate of News Media: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instream Media and Blog Coverage of Climate Chang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5—2008*[D].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2009.
- [13] Han, J., S. Sun, Y. Lu. Framing climate change: A content analysis of Chinese mainstream newspaper from 2005 to 2015[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7, 11.
- [14] Dirikx, A., D. Gelders. Ideologies overruled? An explorative study of the link between ideology and climate change reporting in Dutch and French newspapers[J].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2010(2).
- [15] Giddens, A. *The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9.
- [16] Cerutti, F. Defining risk, motivating responsibility and rethinking global warming[J].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2010(3).
- [17][德] 乌尔里希·贝克. 为气候而变化: 如何创造一种绿色现代性?[A]. 曹荣湘, 编. 全球大变暖: 气候经济、政治与伦理[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 [18][德] 乌尔里希·贝克. 全球风险社会[M]. 吴英姿, 孙淑敏,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 [19] 蒋晓丽, 雷力. 中美环境新闻报道中的话语研究——以中美四家报纸“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报道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4).
- [20] 郭小平. 西方媒体对中国环境形象的建构——以《纽约时报》“气候变化”风险报道(2000—2009)为例[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0(4).
- [21] Wu, Y.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Framing of China in news media coverage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 [A]. Boyce & J. Lewis (eds.). *Climate Change and the Media*[C].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2009.
- [22] Berglez, P., B. Höijer, U. Olausson. Individualisation and nationalisation of the climate issue: Two ideological horizons in Swedish news media[A]. T. Boyce, J. Lewis (eds.). *Climate Change and the Media*[C].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2009.
- [23] Olausson, U. Global warming—global responsibility? Media frames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scientific certainty[J].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2009(4).
- [24] Billett, S. Dividing climate change: Global warming in the Indian mass media[J]. *Climatic Change*, 2010(1-2).
- [25] Rickard, L. N., Z. J. Yang, M. Seo, et al. The “I” in climate: The role of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in systematic processing of climate change information[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4, 26.
- [26] Spence, A., N. F. Pidgeon. Framing and communicating climate change: The effects of distance and outcome manipulation[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0(4).
- [27] Corner, A., L. Whitmarsh, D. Xenias. Uncertainty, scepticism and attitudes towards climate change: Biased assimilation and attitude polarisation[J]. *Climatic Change*, 2012(3-4).
- [28] Howell, R. A., S. Capstick, L. Whitmarsh. Impacts of adaptation and responsibility framing on attitudes towards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J]. *Climatic Change*, 2016(3-4).
- [29] 王彬彬, 张海滨. 全球气候治理“双过渡”新阶段及中国的战略选择[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3).
- [30] Van Dijk, T. *Ideology: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M]. London: Sage, 1998.
- [31] 纪莉, 陈沛然. 论国际气候变化报道研究的发展与问题[J]. 全球传媒学刊, 2016(4).

- [32]裴广江,苑基荣. 多国代表希望发达国家起带头作用,大会主席强调贫穷的人们在等待德班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11-11-29(03).
- [33]Yang, W., W. Wang. On the change of China's identity, interests and behavior in its climate diplomacy from 1999 to 2014[J]. *Studies in Sociology of Science*, 2016(3).
- [34]贾峰. 气候变化离我们遥远吗[N]. 人民日报, 2016-2-27(09).
- [35]Scheufele, B. Framing-effects approach: A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critique[J]. *Communications*, 2004(4).
- [36]Jang, S. M. Framing responsibility in climate change discourse: Ethnocentric attribution bias, perceived causes, and policy attitud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13, 36.
- [37]McCright, A. M., R. E. Dunlap. The politicization of climate change and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s views of global warming, 2001—2010[J]. *The Sociology Quarterly*, 2011(2).
- [38]Bolsen, T., J. N. Druckman. Do partisanship and politicization undermine the impact of a scientific consensus message about climate change? [J]. *Group Processes & Intergroup Relations*, 2018(3).
- [39]王积龙,路鹏程,黄康妮,等. 中美环境新闻记者气候变化报道知识之比较研究——一种第三世界生态批评的阐释[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6(12).
- [40]郑保卫,李玉洁. 论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J]. 国际新闻界, 2011(11).

Whose Responsibility: Discourses of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in Chinese Media Reporting on Climate Change

— Analyzing Coverage of Climate Change in People's Daily and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from 2010 to 2018

LI Jing

Abstract: Using framing as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socio-cogn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as research method,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discourses of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of climate change in *People's Daily* and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from 2010 to 2018. The study revealed that media discourses of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were mainly dependent on representing climate change as either an international issue or a national issu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theme in media reporting on climate change, accordingly responsibility of nations and responsibility divides among nations and allies dominated media discourses. Recently, Chinese media also presented climate change as a national issue, emphasizing government's responsibility in policy-making and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under local climatic or environmental risks. Nevertheless, the cognitive schema underpinning Chinese media reporting on climate change featured responsibility of a nation and its government and responsibility divides among nations. The schema might exist in public's perception of media information. The study extended the understanding of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climate change, and made suggestions for 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Key words: climate change; responsibility attribution; framing theory; socio-cognitive discourse analysis

(责任编辑 孙 洁)